

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

王跃生 著

通过这些著述和文集，我们不仅可以分享教授们的研究成果，领略他们的学术风格，而且可以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脉络，反思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经济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程。

王跃生

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

通过述著述和文稿，我们不仅可以分享教授们的研究成果，领略他们的学术风格，而且可以把那一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脉络、阶段的特殊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程，反思特定历史

王跃生 著

王跃生 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王跃生文集/王跃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

ISBN 7-301-09638-0

I . 制… II . 王… III . 经济学 - 文集 IV .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757 号

书 名: 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王跃生文集

著作责任者: 王跃生 著

责任编辑: 张燕 王蕴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638-0/F·11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346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雎国余

副主编：黄桂田

编 委：何小锋 胡 坚 黄桂田 马国余
李庆云 李心愉 刘 伟 刘文忻
孙祁祥 王大树 王跃生 王志伟
萧 琛 萧国亮 萧灼基 晏智杰
叶静怡 郑学益

序　　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 1985 年 5 月,其前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系始建于 1912 年,是中国高等学校建立最早的经济系科,源于 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

在近百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院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教授们以崇高的敬业精神和执著的经世济民的职业操守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这些教授不仅包括学术泰斗和学界先贤,而且包括活跃于经济学舞台的先贤传人和后起之秀。他们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及迄今为止有 20 年历史的经济学院发展中的开拓者、建设者。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 20 周年庆典之际,我们对历代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院的教授们表达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选录了经济学院部分教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虽然这些著述由于文稿作者的年龄、阅历、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学术视野、价值取向各异,甚至文稿所反映的某些学术观点和理论判断值得进一步斟酌和商榷,但是通过这些著述和文稿,我们不仅可以分享教授们的研究成果,领略他们的学术风格,而且可以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思想脉络,反思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经济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进程。有些论文的思想和方法按今天的某种“学术规范”或“学术前沿”衡量,可能显得“陈旧”和“过时”,但它们却是属于“当时”的学术前沿和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的。从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经济类学科的发展,不仅是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永恒性的“学术前沿”,因为经济活动现象和经济发展过程太具有嬗变性、多样性和生动性,以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的经济学成果怎么可能保持它的不变性?尊重历史、尊重反映各个阶段历史的学术成果,

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成果中吸取养分，借以站在前人成果的肩膀上“创造”我们所处阶段的“学术前沿”，才是学术发展永恒的道理。可以说，这是我们出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的宗旨之一。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集的出版，进一步推进经济学院未来学科的建设，吸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未来的教授们以更精彩的篇章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

真诚地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5年5月

自序

承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大出版社的厚意，使我得以借此次出版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番回顾和梳理。古人讲，文章千古事。虽然在当今这个出版高度商业化、写作高度个性化的时代，文章已不再承载那么重的道德责任，但我仍然很看重文字的社会意义。因此，对有机会出版文集，既如沐春风，又如履薄冰。

本文集收录的是我自1985年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直到今年夏天所写的经济学论文、评论以及学术随笔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时间跨度大约十七八年。这期间，我从一个学习经济学的青年学生成为一个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为职业的经济学家，我的学术研究则从最初的蹒跚起步到如今的逐渐成熟。如果以60岁退休作为职业学术生涯的结束（当然，实际上结束的只是职业，学术活动则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从现在到退休大概还有十七八年，我的职业学术生涯刚好走完了一半。如同一场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时，确有必要总结一下上半场的赛程、得失，调整一下心态、思路，以便在下半场取得佳绩。

本文集中收录的文章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由远及近编排的。这些文章基本可以反映出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方向及其演变。80年代，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问题，这也是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此时期的论文主要涉及苏联和东欧各国（如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的经济体制及其改革。应该说，8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与这些国家改革的紧密关联既为研究设置了很多限制，又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特殊性在本文集中这一时期的篇文章中也有所表现。此后，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和中国经济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的研究也从颇受羁绊，因而多少有些就事论事地讨论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转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研究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作为这种研究的理论基础，90年代以后开始传入我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很自然地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日益深入，企业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难点和中心，我的研究也就进一步扩展到企业理论与企业制度的比较和改革上。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工

作虽然东鳞西爪，时有变化，但其实质和核心却一直是清晰的，即与中国经济改革相联的中外宏、微观经济制度研究。读者从收入本文集的论文中不难看出这种取向。

令人欣慰的是，我遇上了一个经济学从“沉闷的科学”变为“当代显学”的时代，遇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的学术研究活动得以始终伴随着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脉搏，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我本人的学术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而不断形成、深化、趋于成熟，而体现这些思想的文章也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中国改革开放正确战略的形成发挥了尽管十分微小但切切实实的影响。

收录在本文集中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在各种学术期刊和著作中发表过。收入本书时除进行个别技术性订正之外，都保留了当初发表时的原样。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显得相当的幼稚和浅显，甚至谬误，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前述特殊性，就完全可以理解。保留历史原貌有助于人们认识我们思想的发展历程，更加体会到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来之不易，也可以映射出我国经济理论与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以为，总结个人的学术经历固然重要，但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见证，意义当然大得多。

编辑本文集之时恰逢女儿可伊周岁。熟悉的朋友常说是我的“学术事业”耽误了个人生活，以至于年过不惑才顾得上生儿育女。我知道这其实只是一种托辞。否则以本文集这样的“代表性成果”将愧对迟来的女儿。但是，无论如何，我很在意女儿对我的工作结果的看法。谨以此书献给她。

王跃生

2003年秋

于枫丹丽舍寓所

目 录

经济转轨：苏俄、东欧与中国

速度与效率：苏联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	(3)
苏、匈、南企业体制与企业行为的比较	(50)
试论南、波、匈三国的经济滞胀	(62)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	(67)
俄罗斯放开物价与价格改革的模式问题	(75)
试析俄罗斯经济改革方针的调整	(82)
东欧昭示我们什么	(91)
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	(98)
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分析	(109)
政治改革如何改善经济改革的绩效	(118)

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双重模式转换与经济增长速度	(127)
关于欧洲型经济体制及问题的思考	
——试论“欧洲病”	(135)
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	
——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	(147)
家庭责任制、农户行为与农业中的环境生态问题	(162)
当前经济政策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73)
“入世”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181)

企业理论与企业制度创新

亚洲金融危机与亚洲企业的融资制度	(189)
金融压抑与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企业融资制度	(200)
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的所有权 ——以瀛海威公司改组为例	(212)
国际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理论的发展	(223)
论当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融合的趋势	(235)

读书与思考：经济学的理论思索与现实关怀

探索经济的最优运行	(251)
一本书和一个时代 ——从苏联新版《政治经济学》说开去	(259)
立足于现实的思考	(266)
经济改革中的产权、均衡和市场 ——读《经济体制改革三论》	(272)
社会价值、文明交往、民族主义	(278)
环境污染：经济学的思考	(288)
“谁来吃午餐？”	(294)
比较经济学的复兴？	(301)
这一代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	(309)
国家与市场 ——读《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	(314)

经济转轨：苏俄、 东欧与中国



速度与效率：苏联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

前　　言

苏共二十四大以来的三次党代表大会都对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种情况是同近十几年来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日益下降，同苏联经济的低效率密切相联的。

的确，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问题都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所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在前者，这起因于如何挽救“发展过度”的资本主义经济于停滞之中；在后者，则源于如何遏止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保持在增长速度上的优势，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顺乎经济实际需要，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先在西方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增长经济学，后又在东方形成了多少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实验者。在迄今为止苏联六十多年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高的，这种高速度历来被苏联式体制的拥护者认为是该体制成功的最好证明，是该体制的优势之所在。不过，西方的研究者们却持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所注意的焦点是取得这种（据认为经常是被夸大了的）高速度的代价，即从效率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低效率是苏联经济的比其高速度更鲜明的特点，低效率注定了高速度难以持久。进而，他们从经济效率是判明经济制度优劣标准这一观点出发，得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的论断。速度与效率之争终于成了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这里，足见此问题之重要。

本文所要做的就是从速度与效率统一的角度，对苏联经济增长过程提供一个多少带有技术性的分析。分析的结果将表明，几十年来苏联经济增

* 本文是作者的硕士论文，写于1985年，其主要内容发表于《经济科学》1986年第5期。

长速度是高的，效率是低的。这种高速度、低效率的现象与其说是某种制度的特点，倒不如说是政策的产物，是苏联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与自然条件的产物，是在该种政治经济形势下形成的苏联式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本文有别于国内同类题材著作之处在于，作者试图通过数量化的分析，提供一幅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率的尽可能精确的图像，并利用过去 20 年苏联经济中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根据所能收集到的数据，对未来十余年苏联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前景作出预测。同时，作者试图打破相当流行的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惟一标志（至少是最重要的标志）的观念，提出一种通过生产函数计算综合要素投入产出率来衡量经济效率的方法。由于分析的特点，文章将不涉及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不过应该澄清，作者是断然拒绝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之类的论断，并且怀疑仅用效率一个指标判定一种经济制度优劣的方法的。

对苏联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涉及苏联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几十年的历史。不过，限于所掌握的材料，只是对近二十多年情况的分析稍为详细一些。

第一节 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率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速度

（一）经济增长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理论和政策中最常见的概念之一。然而，这一概念的准确意义并不是明白无误的，同时使用这一概念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它的定义是颇为不同的。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人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净国民产品的增加”^①，有人则把它定义得相当繁复。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提供它的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② 库兹涅茨的定义在西方被普遍接受，认为它全面表述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研究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苏联经济学家 B. 卡马耶夫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生产资源变

^① D. W. Pearce,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1981, p. 123.

^② 转引自宋承先、范家骥：《增长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1 页。

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① 著名经济学家 A. 安奇什京则对经济增长作了更通俗的解释。他写道：“经济增长首先就是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的增长以及这种产品无论是作为目前的非生产消费量的增长，还是作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金追加额的增长。”^② 另有一本研究经济增长的专著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一定社会资源的利用过程，其实质首先是在主要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的产出，结果则是生产与非生产资源及非生产消费品总量的增加。”^③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解释。不过，上面列举的几种解释已经可以表明对经济增长概念理解的多样性。我们注意到，各种解释都把产出的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内容，因此，如果要在上述解释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下一个尽可能简短的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系内生产能力的扩展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财富数量增加与质量改善的过程。**

以增进社会财富为宗旨的经济科学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把物质财富的增加当作自己的目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此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乃至庸俗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增长问题有过或详或略的论述。但是，经济增长理论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步伐日益艰难、经济停滞的问题日益尖锐之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无经济增长理论？如果有，那么它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这个问题，而且建立了较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深刻得多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包含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之中，在创立和发展再生产科学的同时，经济增长理论也就形成了。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本身就包括了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示被认为是最早、最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总之，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阐述，虽然马克思并未直接使用“经济增长”的概念。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至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过精辟

^① B. 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中译本），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 页。
^② 同上。

^③ B. 卡马耶夫：《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因素》（俄文版），科学思想出版社 1983 年版。

的论述：其一，对再生产因素（也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论证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二，从方法论上对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指导。马克思树立了正确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榜样，并且建立了最早的较完善的数学模型。其三，对经济增长类型的分析。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两种途径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两种类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当然，经济增长理论同扩大再生产学说毕竟还不是完全等同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是物质产品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三者的统一。经济增长理论虽然与后两个过程密不可分，但却是把自己的视野更多地集中在物质产品再生产过程的。因此，扩大再生产的学说比经济增长理论的范围广阔得多，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是以前者为依据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既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包含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那么，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直接延续与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就应该有不同于当代西方增长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个别零星的研究（如1928年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之外，政治经济学或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保持缄默，或者以一种极端片面的形式提出问题，一提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就是论证高速度的必然性，似乎高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特征，增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正如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的K.米库里斯基所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科学在其发展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它总是去确认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高速度的存在，去反映建设新社会制度过程中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却较少分析形成高速度的机制、达到高速度的条件是怎样的，以及这种速度将来会如何变化。”^①部分由于理论研究本身的深入与进展，更由于高速度这个“自然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国家变得不那么“自然”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终于注意到了经济增长问题，从而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在苏联表现得较为明显，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首先在那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1970年，经济学家M.卡列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概论》在莫斯科出版了。在此前后，用东欧各种文字写成的关于社会主义

^① K.米库里斯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俄文版），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经济增长问题的书籍、文献大量问世，形成一个高潮。^①现在，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日趋深入，往往同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生产集约化联在一起。以上就是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概貌。

（二）经济增长的实质、标准和指标体系

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不过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具体应用；分析时所运用的诸范畴、概念、标准等等，都源于增长理论。因此，在具体应用这些概念、范畴、标准之前，更清楚地说明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以尽量避免分析中的模糊和歧义，无疑是必要的。当我们准备分析这些范畴时，首先碰到的仍是“经济增长”这一范畴本身，即涉及所谓经济增长实质的诸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同经济发展的区别。经济增长同经济发展都是说明经济变动总状态的宏观经济范畴，有时，它们的区别并不是很严格的。如前所述，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社会财富产出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的过程，而经济发展则一般解释为，随着经济进展和人均收入增加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过程。就生产本身而言，除产品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外，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中的结构完善等等。“经济增长以总产值、净产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标志，它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的内容，而且还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更问题，所以它既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又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②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是看其能否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及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发展要伴随增长，但增长本身并不等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是一种经常可以听到的说法。这里区分增长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澄清本文的分析将严格限于增长而不同发展相混淆。我们的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在苏联经济的某些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并未带来相应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性和社会性。我们已经指出，经济增长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产品再生产方面，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物质财富生产的共性方面。譬如，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表

^① 较著名的有：匈牙利经济学家 J. 霍沃什的《经济增长因素》；苏联经济学家 A. 安奇什京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预测》；M. 卡列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概论》；K. 米库里斯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比例》、《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等。

^② 厉以宁：《教育经济学》，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